

目 录

· 史学论坛 ·

秦始皇帝和李斯、赵高	张文立 (1)
秦文化 楚文化 汉文化	王世平 汪红梅 (8)
论“二圣”共建盛唐的政治格局	赵文润 (15)
追踪高句丽末代王高藏冢墓所在 ——兼论高藏入唐后的生活	拜根兴 (22)
武则天被立为后之成功原因试探	胡婷婷 (29)
试论唐代贵族的丧葬之俗	田卫丽 付文斌 (33)

· 考古研究 ·

陕西帝陵文化新议	王世平 (39)
神禾塬秦墓墓主考	王学理 (47)
赵佗陵墓新考	郭声波 苗 峰 (52)
也谈商周青铜器花纹的社会功能	梁彦民 (60)
西周金文字形书体演变刍议	王 帅 (64)
关中地区出土的陶灶	刘卫鹏 张红玲 (69)

· 历史地理研究 ·

秦汉中郡置县考	后晓荣 (82)
汉“百万石仓”与“细柳”地望考	曹发展 (86)
西岳庙故址与更址时代考	吕智荣 (92)
对榆林地区汉代以前环境的一点思考	孙国勇 杨水田 (97)
对西汉长安城轴线问题的一点认识	王 煊 (105)

· 简牍与典籍 ·

晚唐诗人白居易笔下的青铜镜 ——读《白居易全集》有感	张维慎 成荣强 (112)
-------------------------------------	---------------

从《老残遊记》、《铁云藏龟》看刘鹗的社会观及其对甲骨学的贡献…………… 刘 红 (121)

· 民族宗教史 ·

三教圆融

- 白云观的道教文化阐释…………… 张应超 (125)
- 半夜邀僧至 孤吟对竹烹
- 李德裕与佛教及“会昌毁佛”的关系…………… 李文才 (130)
- 试论李德裕与道教…………… 董 理 (137)
- 安阳灵泉寺隋唐浮雕塔定名辨析…………… 李举纲 樊 波 (144)

· 碑石墓志研究 ·

唐昭陵陪葬恩礼考略

- 昭陵碑石研究之二…………… 张 沛 (150)
- 《臧怀恪碑》的刻立时间及碑文内容与书法…………… 路 远 (162)
- 唐贞观二年《李药王墓志》简释…………… 穆渭生 刘 波 (167)
- 从唐代宦官婚姻探考其社会地位
- 以西安碑林藏墓志为重点…………… 景亚鹏 (173)
- 《隋枹罕郡主簿皇甫绪墓志》考释…………… 李 阳 (178)
- 西安南郊新出土一块明代许宗鲁书撰的墓志…………… 肖健一 王春晓 孙安娜 (182)

· 随笔札记 ·

- 论殷墟在中国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 杨东晨 (186)
- 拓拔思恭卒年考…………… 牛达生 (192)
- 宋代“罚刑”研究…………… 高叶青 (197)
- 李柏“关学”和他的书法艺术…………… 李雪芳 (202)
- 浅谈中国古代对于盗墓的预防措施…………… 王卫红 (205)

· 文物丛谈 ·

再议青铜盆

- 从新发现的中市父盆谈起…………… 张懋谔 王 勇 (210)
- 试论青铜盘…………… 李先登 (215)

鏹与鏹斗	翟晓兰 (219)
小议汉代铜镜中蕴含的时代精神	陈姝婕 翟晓兰 (225)
观中堡村出土之唐三彩有感	王建玲 (229)
西安碑林博物馆藏《李元鼎行述》及李元鼎之研究	张 岩 (234)

· 馆藏精品 ·

谈张居正和万历九年鱼鳞图册	李 凯 王建玲 (240)
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藏传佛教造像	赵 青 (247)
张崑的两幅山水画赏析	董 洁 (256)
两件珍贵的近现代文物	韩建武 张 鸣 (260)

· 壁画与艺术史 ·

从西安地区唐墓壁画中的女性看初唐的绘画风格	杨效俊 (262)
从唐墓壁画与日本墓葬壁画看 7—8 世纪两国墓葬壁画的色彩	白丽莎 (270)
浅谈美的价值	刘江英 (279)

· 博物馆学 ·

社会进步的标志	
——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	魏 博 魏世刚 (281)
变化中的中国博物馆教育	庞雅妮 (286)
博物馆三题	李淑萍 (290)
博物馆与公众休闲	郝 娟 (294)
馆藏文物总登记号问题刍议	师小群 (297)
西安地区博物馆旅游创新研究	田小娟 (302)

· 博物馆工作 ·

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 大力推动博物馆事业发展	冯庚武 (309)
考察印象	
——赴巴黎参加“秦兵马俑展览”代表团工作	王 彬 (313)
洛杉矶宝尔博物馆“秦俑：秦始皇的卫士展”随想	杨 瑾 (319)
一次难忘的接待	
——记吴冠中先生参观壁画库	申秦雁 (324)
赴韩国交流学习的感受与启示	杨爱萍 (327)

谈我省文物数据库的系统集成问题	邵小龙 梁彦民 (330)
对文物资料数据库建设的一点理解	刘万虹 王建荣 (336)
创新服务理念 践行文化使命	
——陕历博免费开放后观众调查表启示	高 嵘 杨 歆 李 鹏 (340)

• 文物保护 •

青铜文物修复所用低温焊料的研究	徐建国 (343)
谈唐墓壁画保护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罗 黎 (348)

• 书 评 •

区域历史宗教文化地理研究的新开拓	
——《西北佛教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简评	艾 冲 (353)
“古人日已远 青史字不泯”	
——《汉字起源与原理》评介	张铭洽 (355)

• 补白 • 鸾鸟翼鹿纹银盒 (21) 书讯 (28) 忍冬鸂鶒纹云头形银粉盒 (81)	
书讯 (85) 鎏金铜虎镇 (278)	
Main Contents	(357)
本刊征稿	(359)

· 史学论坛 ·

秦始皇帝和李斯、赵高

张文立

秦始皇帝的文官自然很多，但见于记载且与始皇帝关系甚密者却较少，主要有吕不韦、李斯、王绾及赵高等。本篇则主要谈一下吕不韦以外的几个人。如果说武将们在攻城掠地攻灭六国为秦帝国的建立创造了不世之功的话，那么文官们则在秦统一以后建立一个什么样政体、国体，以及如何治民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所谓武功以后看文治嘛。这些文官们也直接影响着始皇帝的政治理念，影响着新建立起来的秦王朝的命运。

一 王绾等人

秦王政及始皇帝时的丞相，史载其名者约有六人，如表一。

表一

	元年至十年	十年至二十一年	二十一年至三十四年	三十四至三十七年
右相	吕不韦		隗 林	冯去疾
左相	昌平君	昌平君	王 绾	李 斯

这六人中，隗林的名字见于始皇二十八年（前219）《琅琊刻石》：“丞相隗林（一作状）、丞相王绾”云云^①。冯去疾见于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出巡时，“左丞相斯从，右丞相去疾守”。二世元年，东行郡县，与李斯同陪驾前行，并与李斯、御史德同列名刻石。二世二年（前208），冯去疾、李斯、冯劫下于吏，审问定罪。去疾、劫曰：“将相不辱”，自杀。昌平君，楚人，见于秦王政九年（前238），长信侯作乱，秦王政令昌平君、昌文君发卒平乱。秦王政二十一年（前226），“昌平君徙于郢”。《睡虎地秦墓竹简·大事记》“二十一年韩王死。昌平君居其处。有死口属。”二十三年，“荆将项燕立昌平君为荆王，反秦于淮南。二十四年（前223），王翦、蒙武攻荆，破荆军，昌平君死，项燕遂自杀”^②。

王绾其人，在始皇帝二十八年（前219）《琅琊刻石》中列名于隗林（状）之后。他的事迹主要在二十六年（前221），统一以后议帝号时，丞相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秦王政提出，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对于政体，王绾等的建议是：“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镇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这个

意见是在距首都较远的燕、齐、楚地设立诸侯王，行封建，其他地方实行郡县制，恰如以后的刘汉郡国双轨制。始皇帝将王绾的意见交群臣讨论，群臣都认为很妥当。任职廷尉的李斯却认为：“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讎，诸侯更相攻伐，周天子弗能禁。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对李斯的建议，始皇帝说：“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一锤定音，李斯的建议被采纳，春秋初期到战国各国出现的新政治体制，即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政体在神州大地作为唯一的体制施行，行之二千年而不衰。但对王绾并未另加处置，仍然做他的丞相，仍然伴驾出行，刻石留名。

二 李斯攀龙

李斯其人，名高诟亦多，我在《李斯评传》中已经论述过^③。

李斯，字通古，楚国上蔡人。他在楚国得不到重用，仅是郡中一名小吏。他从厕中鼠与仓中鼠的境遇中得到启示：要富贵，必须改变自己所处的环境，即所谓人挪活，于是放弃小吏，转而求学于战国晚期的著名学者也是儒家的殿军人物荀况，与韩非同窗。两种老鼠的境况在他的印象中太深了，他提出“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诩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④。这是对自己所见老鼠现象功利性的理论概括，可谓之“鼠哲学”。前247年，秦庄襄王死。他从没落的楚国，投靠在如日中天的秦国的相邦吕不韦门下，作了一名舍人，后升为郎，可以游说秦王了。他向秦王政提出的让间谍收买敌国大臣，收买不成予以暗杀的策略，受到秦王政称赞，升为客卿。秦王政十年（前237），因郑国事秦王驱逐客卿。李斯上《谏逐客书》，得免，后任廷尉。秦始皇帝三十四年（前213），始任左丞相。他在廷尉的位子上待了十余年。

李斯在始皇帝时期，确实做了几件大事。第一件是，初入秦时，参与制订了灭六国的具体策略，间谍先行，金钱与刀剑并行，大军继之。第二件是，上《谏逐客书》，启发秦王多吸纳各国人才。第三件是，极力主张强有力的君主专制制度，推行郡县制，绝对摒弃分封制，不留分封制的任何残余。第四件是，统一文字，与胡毋敬、赵高亲写普及秦小篆的标准字形。第五件是，强力推行绝对的思想一致，焚书坑儒。第六件是，随始皇帝的车马巡行全国，为始皇帝歌功颂德，申明秦法，是始皇帝手下一位得心应手的笔杆子。在这十余年中，他志得欲从，位高权重，得到了他想得到的一切。于是，出行时随从的车辆也多了起来，前呼后拥，十分招摇。但是，始皇帝不高兴了。始皇帝三十五年（前212），始皇幸梁山宫，从山上望见丞相车骑众，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后损车骑。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语。案问莫服。当是时，诏捕诸时在旁者，皆杀之”^⑤。李斯虽受到始皇重用，但也不那么自由自在，不时心怀警惕。将始皇帝“弗善之”的消息告诉李斯的“中人”是谁，已不可知，但它明确地告诉后人，李斯在始皇帝身边安排了自己的人，以察始皇帝的微旨。这样明显地在皇帝身边安排情报人员，其罪不小，但始皇帝只杀了当时身边的人，而未追究李斯，也算宽宥了他。

公元前210年，始皇病逝沙丘，李斯在赵高的鼓励下，加入了谋权的铁三角。胡亥做了

二世皇帝后，李斯的日子便不好过了。二世元年，杀大臣及诸公子公主的血腥，使李斯胆寒。二世二年，冯劫、冯去疾自杀。接着，因为陈胜、吴广起义，吴广兵入李斯儿子李由所任郡守的三川郡，章邯收复三川郡后，使者覆案三川相属，指责李斯位居三公，却让国家遭到这样的乱象。李斯恐惧，便向二世上书说：“夫贤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责之术者也。”让二世明申、韩之术，行商君之法，简言之，即严厉镇压。二世见到李斯上书“于是行督责益严，税民深者为明吏”，在全国造成“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积于市”的恐怖局面。李斯为了使自己解脱而不惜造成秦王朝的全面恐怖，虽中二世之心但赵高仍在给他设圈套。赵高找到李斯，说关东群盗多，而皇帝仍然修建阿房宫，畜养狗马无用之物。我想劝谏，但地位卑微，这才是你丞相应该管的事。李斯很愿意面见二世。赵高说：我给你找个机会见皇上。他把时间安排在二世在甘泉宫游乐正高兴时，李斯求见，扫了二世兴致，二世不见他。李斯上书言赵高之短，指出赵高“故贱人也，无识于理，贪欲无厌，求利不止”等。二世将这些告诉了赵高。赵高说：“丞相所患者独高，高已死，丞相即欲为田常所为。”即要夺权篡位。二世说：“其以李斯属郎中令。”李斯落在了赵高手中。赵高以李斯与李由谋反罪，收治了李斯家属及宾客。此时的李斯仍然对二世抱有幻想。他向二世上书，陈述自己的“七大罪状”。这七大罪状很有意思：

臣尽薄材，谨奉法令，阴行谋臣，资之金玉，使游说诸侯，阴脩甲兵，饰政教，官斗士，尊功臣，盛其爵禄，故终以胥韩弱魏，破燕、赵，夷齐、楚，卒兼六王，虏其王，立秦为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广，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见秦之强，罪二矣。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亲，罪三矣。立社稷，脩宗庙，以明主之贤，罪四矣。更刻画，平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树秦之名，罪五矣。治驰道，兴游观，以见主之得意，罪六矣。缓刑罚，薄赋敛，以遂主得众之心，万民戴主，死而不忘，罪七矣。

细观这七条，每条都是很大的功劳，何罪之有。这种做法与韩非在《内储说》上《七反》中的“倒言反是”有相仿佛的地方，以功作罪，引起二世注意，引发二世内心反省而予以脱罪。李斯用心良苦，无奈二世惟赵高之言是听，而赵高的目的是让他死。所以，书上，赵高说“囚安得上书”，加紧拷问，让李斯承认谋反罪。并让自己的门客装成御史、侍中等核查，李斯便改口说出实话，于是又拷打，多次以后，李斯不敢改口，于是，李斯腰斩于咸阳而夷其三族。李斯就刑前，对他的二儿子说：“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唐人胡曾在《上蔡》诗中说：

上蔡东门狡兔肥，李斯何事忘南归？功成不解谋身退，直待云阳血染衣^①。

李斯仓中鼠的愿望在始皇帝时曾经达到，但最后付出了代价。

李斯应该说是一位有才气有才干有思想的人物。他的《谏逐客书》文情并茂，流传千古；他的小篆书法、铁画银钩，百代师法；他帮始皇帝统一六国，规划新的政体，建立了不朽功业。但是，正如班固在《汉书·薛宣朱博传·赞》中所说：“薛宣、朱博皆起佐史，历位以登宰相。宣所在而治，为世吏师，及居大位，以苛察失名，器识有极也。”李斯出身微贱，只想改变自己的处境，追求权势，因而助纣为虐，先是建言焚书，继而坑儒；沙丘之谋，以丞相身份，追随中车府令赵高，扶二世上台；二世时，又建言行“督责之术”，为二世时的恐怖政策推波助澜，致其族见诛。其才气才能到此时也相形见绌，上二世书则一副奴颜，不可卒读。他始终没有摆脱小吏心性，致其器识受到限制，难成大家。与他同事苟卿的

韩非死于他的手中。倒是与他同事荀卿的另一位同窗浮丘伯（包丘子），按《盐铁论·毁学篇》所记，李斯入秦，取三公，据万乘，制海内，而浮丘伯饭麻蓬藜，修道白屋之下，乐其志，安之于广厦刍豢，无赫赫之势，亦无戚戚之忧。汉时，刘交、汉诸生、白生、申公等向他学习《诗经》。吕后时仍居于长安，淡于名利，不求闻达，专心学问，多有己见。《三才图会》载他作《原道歌》曰：“虎伏龙亦藏。先伏虎，但毕河车功，不用提防。拒诸子，学飞仙，狂逆不得住。左右得君臣，四物相念护。乾坤法象成，自有真人护。”二人器识之别，悬于天壤。

三 赵高弄权

赵高是秦末一位重要人物^⑦。

秦王朝二世而亡，赵高弄权是其中原因之一。所以王夫之说：“剿二世之首，欲灭宗室，约楚降，而分王关中者，赵高也”^⑧。司马迁在《史记》中未为赵高列传，将其事迹杂于《秦始皇本纪》、《李斯列传》、《蒙恬列传》中加以叙述。《蒙恬列传》中记载：

赵高者诸赵疏远属也。赵高昆弟数人，皆生隐宫，其母被刑僇，世世卑贱。秦王闻高强力，通于狱法，举以为中车府令。高即私事公子胡亥，喻之决狱。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当高罪死，除其宦籍。帝以高之敦于事也，赦之，复其官爵。

这便是赵高前半生的简历，透出了几个重要信息，一是赵高有力气，会办事，通狱法；二是他同秦始皇帝的关系甚密。是始皇帝把他从卑贱之地拔擢出来的，也是始皇帝把他从死罪中救出，并官复原职的；三是他同公子胡亥的旧交甚笃，给胡亥讲解过狱法。就是这种关系，加上赵高的狡诈，预伏了以后秦王朝的灾难。但是，值得关注的是，秦始皇帝虽然喜欢赵高，但直到始皇帝三十七年（前210）沙丘之谋时，赵高始终没有再升迁，就是一名中车府令，虽处要害部位，但是官位并不很高。

秦统一六国后，始皇帝令李斯作《仓颉篇》，赵高作《爰历篇》，胡毋敬作《博学篇》，用小篆作文，推动文字改革，对秦统一文字起到了重要作用。秦始皇帝五次出行，赵高自应以中车府令的身份相随，到三十七年（前210），始皇帝病逝，赵高才活跃起来。

始皇帝南巡，归途中病逝沙丘。赵高得幸于胡亥，想立胡亥为二世皇帝。他向胡亥说：“方今天下之权，存亡在子与高及丞相李斯耳，愿子图之。且夫，臣人与见臣于人，制人与见制于人，岂可同日道哉。”然后用汤、武革命等说明这是正义之举，现在正是机会，“狐疑犹豫，后必有悔。断而敢行，鬼神避之，后有成功。”“时乎时乎，閒不及谋，羸粮跃马，惟恐后时。”胡亥同意后，赵高便向李斯做工作。他先说如果扶苏当皇帝，蒙恬必为相，对李斯不利；再说胡亥慈仁笃厚，轻财重士，秦之诸公子都不如胡亥；最后说：“君听臣之计，即长有封侯，世世称孤，必有乔松之寿，孔、墨之智。今释此而不从，祸及子孙，足以为寒心。善者因祸为福，君何处焉？”既利诱，又有威胁。李斯动摇了。这是以赵高为中心，以胡亥做皇帝为目的，以李斯为强势基础形成的铁三角进行的一次夺权阴谋。结果，这个阴谋在赵高的三寸舌上完成了。接着，赵高与李斯制造伪诏，使扶苏自杀，蒙恬被杀，运始皇帝柩至咸阳，安葬于骊山下。

二世元年（前209），赵高向二世提出：“明主收举余民，贱者贵之，贫者富之，远者近之，则上下集而国安矣”。于是开始屠杀大臣及始皇帝诸公子、公主。二年（前208）他向二世提出：“今陛下富于春秋，初即位，奈何与公卿廷决事。事即有误，示群臣短也。”取消了皇帝与大臣廷议制度，皇帝在宫中只与赵高决定社稷大事。杀了冯劫、冯去疾。李斯因其子李由为三川守时，不能抵抗农民军而受到追究，并被腰斩咸阳市，夷三族。三年（前207），赵高在朝堂做了一个指鹿为马的游戏，以测验自己在朝廷百官中的人气。以后便以泾河神作怪，二世在望夷宫中祈神，并使人责问关东农民起事的事。赵高害怕了，便令女婿阎乐率军杀了胡亥，立始皇帝兄子子婴为秦王。子婴即位后以计杀了赵高。秦王朝的大厦，也随之倾覆。

官场中玩弄权术，有的人可以把权术玩到极致，充分发挥权力的作用。赵高便是这样的人。他官并不大，直到二世三年（前207）才当上了中丞相，但是，他先是讨得始皇帝欢心，后又得到胡亥保护。他利用这一点，助二世上台，杀功臣，连有智慧有辩才的李斯丞相也被他玩死。当然，他最后也被自己玩死。唐人周昙在《咏史诗》中吟道：

赵高胡亥速天诛，率士兴兵怨毒痛。丰沛见机群小吏，功成儿戏亦何殊^⑨。

是说由于赵高、胡亥之为乱，刘邦等几个小吏的成功与儿戏没有分别。

后世有人对赵高的行为作了“曲线反秦”的另类解读。晋时王嘉在《拾遗记》中，有一段记述：

秦王子婴立，凡百日，郎中赵高谋杀之。子婴寝于望夷之宫，夜梦有人身长十丈，鬚鬓绝青，纳玉舄乘丹车，驾朱马而至宫门，云欲见秦王子婴，阍者许进焉。子婴乃与言。谓子婴曰：“余是天使也，从沙丘来。天下将乱，将有同姓者欲相诛暴。”翌日乃起，子婴则疑赵高，囚高于咸阳狱。悬于井中，七日不死，更以镬汤煮，七日不沸，乃戮之。

子婴问狱吏曰：“高其神乎？”狱吏曰：“初囚高时，见高怀有一青丸，大如雀卵。”时方士说云：“赵高先世受韩终丹法，冬月坐于坚冰，夏日卧于炉上，不觉寒热。”及高死，子婴弃高尸于九达之路。泣送者千家，或见之一青雀从高尸中出，直飞入云。九转之验，信于是乎！子婴之梦，即始皇之灵，所著玉舄，则安期生所遗也。

这自然是一则志怪故事。其中透出的信息是：赵高立了子婴，又想杀害子婴；始皇帝灵魂不灭，托梦于子婴；秦赵同祖，所以始皇帝说赵高是“同姓者”；赵高又有方士身份。齐治平校注中，引了一段话：“平步青《霞外攬屑》卷八《复堂日记》清泉欧阳轩赤城《月到山房诗》有《赵高》一绝云：当年举世欲诛秦，那计为名与杀身；先去扶苏后胡亥，赵高功冠汉诸臣。意已恢诡。后又云：阅《古逸史》，载赵高为赵之公子，抱忠义之性，自宫隐秦宫中，为赵报仇。张良大索时，即避高家，故得免难”云云。所称《古逸史》，不知何书。庸按：《陔余丛考》卷四十一《赵高志在报仇》条：赵高之窃权覆国，备载《李斯传》中，天下后世，固无不知其奸恶矣。然《史记索隐》谓高本赵诸公子，痛其国为秦所灭，誓欲报仇，乃自宫以进，卒至杀秦子孙，而亡其天下，则高直以勾践事吴之心，为张良报韩之举。此又世论所未及者也。（原注：《湖楼笔谈》卷三：考《蒙恬传》，赵高昆弟数人，皆生隐宫，其母被刑戮，世世卑贱，则《索隐》谓高本赵公子，自宫以进者，亦未必然耳。）^⑩我在《试论赵高》一文中，未采此说。但历史评说，见仁见智，且其中亦有对始皇帝及秦史研究

的一些可资参考处,且亦非无理,故钞存于此,待与方家共商,一般读者亦可从中扩大视野云。

四 几点启示

秦始皇帝与王绾、李斯、赵高等人的关系,使我们有以下启示。

其一,王绾和李斯政体之争的结果,反映了始皇帝对历史发展形势把握上的疏漏或超越。公元前221年,即秦始皇帝二十六年,秦统一以后的第一年,在讨论秦政权的政体形式时,王绾和李斯的建议有相同之处,也有重大区别。王绾并不反对郡县制,而是考虑到一些边远地区,提出“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镇之,请立诸子”。这个意见在当时应该还是比较适宜的。这也不是王绾的发明,而是西周以来的贵族政治以血缘为纽带巩固中央政权的做法,行之已近300年(前1046—前770),即使到了春秋时期,周王权力失控,对诸侯指挥不灵,但是,大国争霸,也往往打出尊王旗号,可见周王的作用并未消失。就连地处西部的秦人先公,也以尊王为出发点。秦襄公(前777—前766),也是因护送周平王东迁,被封为诸侯的。秦景公(前576—前537)墓出土的石磬铭文中,有“天子匿喜共桓是嗣”^⑩。其中的天子是周天子,是秦公宴喜周天子,仍然尊周天子。此时已是春秋中晚期了。战国以后,周天子对诸侯的控制已经无力,但秦在孝公十九年(前343),周天子对秦“致伯,二十年,诸侯毕贺。秦使公子少官率师会诸侯逢泽,朝天子”^⑪。周天子的余威仍在,秦也尊奉周天子,把自己当作周天子分封的一位诸侯。随着周天子权力的式微,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贵族政治的解体,各国开始设郡、设县。郡县之设则中央直接管县,君主政治的因素在贵族政治中萌芽和成长^⑫。战国至秦,便是社会政治制度嬗变的转型时期,其中主要表现便是由封土建国的领主制向郡县制的君主制的演变。秦始皇帝完成了这个转变,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了郡县制,这是一个进步,但也影响了秦王朝的统治。

社会转型期新旧制度不管在制度建设,还是人们习惯、思想意识等方面,都充满了新与旧、保守与开放、落后与先进、复旧与革新的矛盾和冲突。在这些矛盾和冲突中,领袖人物便承担着解决这些矛盾冲突的主导作用,也考验领袖人物的政治智慧。解决得好,新制度便充满生机地向前发展;解决不好,旧制度的代表人物便会乘机而起,取而代之。所以,在必要的时期,对旧的制度还须迁就一下,才能使社会平稳过渡。在李斯的建议下,秦始皇帝有些超前和急功,结果被六国贵族乘农民起义之机,夺取了政权,导致项羽全面封王。刘邦推翻项羽后,接受了教训,采取正如王绾说的郡国双轨制,让分封制在局部地区继续,结果成功了,并影响了以后两千年的中国政治制度^⑬。这说明了历史发展是不可超越的,两种社会制度交替中间,应该有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时期,欲速则不达。

其二,始皇帝的宠信,使赵高得以玩弄权术。孔子曾经说过,纣处下风而众恶归之,故君子不处下风。不处下风,则要争上风,以求显达。欲显达,则处于权位的人,各逞其技,也就是权术。法势术是古代法家的三个基本层面,上者行法,中者恃势,下者玩术。关于术,韩非讲得很多。李斯注意到了韩非所说的人主像龙一样,颈上有逆鳞,拂之者死。李斯服从于始皇帝,听到始皇帝对他出行车骑多有微词,便赶紧减少。他参与沙丘之谋,也是怕扶苏一旦当了皇帝,对自己不利。赵高则早得始皇帝宠信,而且一直比较信任。李斯为保自

己的既得利益，而寻求合伙人；赵高则以弄权弄术的小人行为而固权，并希望高升，这便是他们能够最终走到一起的思想基础。他们所利用的便是始皇帝的权力和威势，尤其是赵高。李斯后来又欲除赵高，上书二世，揭发赵高，但时间、对象都不同了，所以行不通。这也可以看出，李斯欲以二世之势制服赵高。但是，赵高的术，已得先机，早已有了势，所以李斯失败。李斯始终在借势，赵高则以术求势。公允地说，李斯是有学问、有才能的，赵高也不是胸无点墨地混迹官场。他们都是凭着自己的那一点才能及能言善辩，弄些机智和表示忠诚得到始皇帝的赏识的。始皇帝使他们羽毛逐渐丰满。始皇帝死后，他们性格中恶的一面才逐渐暴露，赵高更为肆无忌惮。对这种人应该是警惕的，但是，明白个中道理的人多，而在实际生活中能发现并断然处理的人却如凤毛麟角。始皇帝就因此为秦王朝留下灾难。

其三，始皇帝用人之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始皇帝对李斯和赵高的使用还是比较慎重的。在统一战争中，李斯的功劳不可谓不大，但一直任九卿之一的廷尉，直到始皇帝三十四年（前213）才任丞相，距始皇帝去世只有三年了。赵高则一直未进九卿之列，最大的官位是中车府令，二世三年（前207）方任中丞相，这时秦王朝已危如累卵了。但是，始皇帝没有深刻认识这二人也是有失察之处的。汉代贾谊说：秦“以赵高、李斯为权，故有倾仆跌伤之祸。何故，所任非也”^⑤。《盐铁论》中说：赵高以其权决罪……二世见杀^⑥。清王夫之则直指“秦之所以殄灭而降辱者”，都是在于用了赵高这个小人。“狎及小人，祸必发于小人”^⑦。这些论断都切中其弊。为政用人，可不慎乎！

注 释

①《索隐》云：隗姓，林名，有本作状非。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书证》中指出，隋开皇二年（582）五月，长安民鑿得秦时铁称权，铭文为丞相隗林。见王利器《颜氏家训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415—417页。

②《史记·秦始皇本纪》。马非百《秦集史》据秦简《大事记》，认为秦王政二十一年，昌平君已死“口属”，不当有二十三年反秦事。而《睡虎地秦墓竹简·大事记》注释者注⑨《昌平君》条中，仍从《史记》待考。

③见张文立主编：《秦史人物论·李斯评传》，陕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151—170页。

④《史记·李斯列传》。下引此文者不另注。

⑤《史记·秦始皇本纪》。

⑥《全唐诗》，中华书局，1979年，第7430页。

⑦详见拙作《试论赵高》，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编《秦汉史论丛》第四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38—154页。

⑧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秦始皇》，中华书局，1975年，第14页。

⑨《全唐诗》，中华书局，1979年，第8352页。

⑩《拾遗记》，王嘉撰，齐治平校注，中华书局，1983年6月版，第105—107页。

⑪王辉、焦南峰、马振智：《秦公大墓石磬铭》，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七本第二分册。

⑫《史记·秦本纪》。

⑬详见张文立：《秦学术史探赜》下编《君主政治的确立》，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296—309页。

⑭张文立：《秦隋现象简论》，《秦文化论丛》第十三辑，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1—13页。

⑮《新语·辅政》。

⑯《盐铁论·周秦》。

⑰《读通鉴论》卷一。

（张文立：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研究员）

秦文化 楚文化 汉文化

王世平 汪红梅

一 秦文化

秦文化包括两部分：统一前的秦文化是一种地域文化，指的是秦国地方的文化，包括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而统一后的秦文化是一种时代文化，即秦王朝的文化。秦文化在相当长时期内，被人认为是落后文化，秦人被视为“夷翟”，但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却使人们的看法不能不有所改变。

秦都雍城位于今陕西凤翔，考古发掘证实，雍城的城墙是很高大的，而城垣面积更达到惊人的11平方公里，比东周王朝的都城洛阳还要大；在雍城遗址，发现了大批春秋早期的铁器，这不仅在中国，也是整个东亚地区最早铁器之一；秦穆公时戎狄的使者由余来到雍城，面对豪华壮丽的宫殿，不由得感叹道：“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则苦民矣”；最使人印象深刻的是，上世纪70年代在雍城南郊发掘了秦国国君的墓地。其中的秦公一号大墓长达300多米，总面积5334平方米，深24米，是中国考古史上发掘的规模最大的陵寝。它的棺槨用整根的巨木垫起，这就是那个时代最高级别的葬式“黄肠题凑”。

秦文化的渊源是周文化。秦与周都崛起于陕西的宝鸡地区，而且在时间上紧随其后、一脉相承。周文化是中国青铜时代发展的巅峰，所以孔子无限崇敬地说，三代之中，“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秦人接过了周人的文化火炬，出土的秦国青铜器如体量硕大的、纹饰精美的秦公罍、秦公钟；为后世所景仰的中国最早刻石石鼓文；被孔子收入《诗经》的二十篇《秦风》、《豳风》（《豳风》可纳入秦文化的范畴），都使人肃然起敬。早期秦国是一个落后的西陲小国，它接过了周文化向四面八方学习、从外来文化中广泛吸取营养的传统。秦的四周是内涵各不相同的文化，东边是三晋文化，南边是巴蜀文化，西南边是楚文化，西北是戎狄文化，而北边又是从鬼方到猃狁再到匈奴的草原文化。身处不同文化的包围，秦人采取积极开放，兼收并蓄，广泛吸纳不同文化的态度。经过学习、学习、再学习，努力、努力再努力的艰苦过程，秦国终于强大起来，在秦穆公时甚至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秦人意识到了自己的落后，“知耻而后勇”，他们大步流星开始了赶超先进的步伐。不仅在生产技术方面急起直追，而且在意识形态等方面也有着跳跃式的发展。面对各国模糊的先祖意识和混乱的文化意识，秦人敏锐地发现，只有高举“炎黄苗裔”和“华夏正宗”的大旗，才能在当时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产生广泛的号召力。于是，秦灵公三年（前432），秦立上下畤，也就是两个祭坛，上畤祭黄帝，下畤祭炎帝，明确把自己列为炎、黄的后代，将自己的文化归入华夏文化的体系，这不仅是有重大意义的政治行动，而且也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归宗与认同，通过此举秦人将自己的文化同“夷翟”彻底划清界限，从而扛起华夏文

化正宗的大旗，成为引领思想文化潮流的先驱者，为最后统一中国奠定了思想文化的基础，也使统一变成回归“华夏正统”的正义行动，极大地增加了统一进程的合理性和正义性。

积极开放，这是秦文化最重要、最有意义的特征之一。秦国大量吸收并重用外来人才，成了春秋战国时期人才最富集的地区。外来人才受到重用，他们感激涕零、知恩图报，纷纷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帮助秦国登上了霸主的宝座。中国古代关于发现人才最著名的故事是“伯乐相马”，而这个故事发生的背景就是秦国。到战国后期，秦国在人才方面的优势长盛不衰，秦武王、昭王两代共有丞相13人，其中10人都是外来的客卿。到秦始皇时，面对一次突发的间谍事件，秦始皇下令驱逐外来人才。但当他读过李斯的《谏逐客书》之后，翻然悔悟，不仅收回成命，而且更加强了重用外来人才的势头。中国古代最伟大的两项水利工程都诞生在秦国，这就是举世闻名的都江堰和郑国渠，它们完工后，成都平原和关中平原都成为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使秦国的经济实力超过战国中的任何一国。而改变历史的伟大工程郑国渠，就是由外来人才、韩国水利专家郑国主持修建的，后来这条渠就以郑国命名。可以说，只有在秦文化的背景下，才有可能诞生都江堰和郑国渠，它们的建成是秦文化的伟大胜利。

秦文化的又一大特征就是勇于变革。穷则思变，秦国是那一时代锐意进取的典范，多次进行政治经济方面的改革，其最成功的例子就是著名的“商鞅变法”。“商鞅变法”也是依靠外来人才商鞅主持进行的，而变法的对象则是秦国自身。经过这次成功的变法，秦国真正走向富强，在胜利和统一的道路上高歌猛进，大步前进。继商鞅、李斯、郑国等大批外来人才之外，战国时法家的领军人物韩非也来到秦国。他主张的大一统国家观与君主专制制在秦国得到实施。可以说，秦文化这种勇于变革的特质，是商鞅、韩非他们得以成功的重要原因。古代陕西成为中国政治改革成功率最高的地方，就是从秦国的改革开始的。

重用人才、重用外来人才，表现出一种广博的文化心胸、宏大的文化气度和开阔的文化视野，即人们常说的“大量”、“大气”，这也是秦文化的特征之一。为人所传诵的“三晋晋难”即援助有困难的晋国，使秦国打了一场漂亮的外交仗，为秦国争得了一个有利发展的外部环境；秦始皇时不听老将王翦的意见、贸然伐楚遭到失败，而个性极为刚毅、自尊心极其强烈的秦始皇，这时却能拉下脸面，亲自到王翦家中赔情道歉，恳请他重新出山带兵伐楚，并将全国军队都交给王翦指挥，最终灭掉了楚国。这个例子与秦始皇宽恕间谍郑国、让他继续主持水利工程的例子一样，不仅是秦始皇个人的性格调节、能屈能伸，同时也是秦文化成熟程度的标示。

全国统一后的秦文化，已经走出地域文化的局限，变成一种更为宏观的大文化。这里突出的例子就是《吕氏春秋》的诞生。秦相吕不韦召集门人著书立说，自任主编，编成一部巨著《吕氏春秋》。这部书在秦以前的所有著作中不仅篇幅最多、部头最大，而且是整个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集大成者，同时还是对诸子百家的一个历史性总结。书中包括流行各地的儒、法、墨、道、阴阳、五行各家，洋洋洒洒，数十万言，以一种科学精神收纳其中。正是由这部有计划、有组织编纂的文集开始，使中华文明进入一个构建理论体系的新阶段。

与这个例子异曲同工的，还有秦篆的诞生。战国时期，各国书体很不统一，写法、识法各各有异，非常不利于文化交流。经过秦相李斯等人的博采众长与整理加工，最后发明出一种新的书体——秦篆，它是秦国的官方书体，后来又成为秦统一文字的标准。“车同轨、书同文”，秦篆作为重要的统一项目之一，对秦统一和中国文化的发展，所起到的巨大作用是

难以估量的。可以说,秦篆的诞生,标志着秦人的文化视野已扩展到全国,秦文化正在变得博大精深,变得深沉厚重。

后期秦文化不仅是地域文化的汇总,而且是历史文化的总结。秦始皇从上古的“三皇”、“五帝”中截取“皇帝”二字作为自己的称谓,同时在前边冠以“始”字,意思很显然:自己的功业超越了最杰出的三皇五帝,超越了历史,而自己的帝业将会二世、三世继续传下去,直至永远。将“始皇帝”的意义放大,那就是后期的秦文化,已经是一种总结中华文明历史的新文化。

秦文化中最引人注目的文化成果自然是秦始皇兵马俑。限于篇幅,对兵马俑的性状、价值就不再赘述,这里只简单谈及兵马俑的文化性质与缘起。首先,兵马俑集中显示了当时秦人的最大关注或最大焦虑:庆祝秦灭六国,防备六国复辟。兵马俑以严阵以待的军阵形式出现,这其实不但是秦始皇陵的文化主题,而且是秦文化一以贯之的重点或主题。秦文化极为重视耕战,所以军旅文化当然是表现的重点。从秦始皇陵陵园的总体来看,虽有文官、百戏、珍禽异兽等其他俑坑,但它们加起来的总和也不及兵马俑坑的规模,气势上更无法相比;其次,兵马俑是举全国之力才得以完成的,史载营建秦始皇陵动用的人力达70万之巨,这根本不是一个小国、一个地区能独立负担的;同时,像华美无比的铜车马,其纹饰、图案和装饰手法,都是典型的楚文化风格,与不尚浮华、强调威严的秦文化截然不同;做工精细、装饰华丽的秦乐府钟、虎纽錡于等珍贵文物也带有明显的楚风。秦灭六国后,曾迁六国宫殿、歌舞和工匠于咸阳,这既是文化的集中,也是文化的交流,促使秦文化由地域文化向统一文化转化;秦人虏获著名的魏国国器“安邑下官钟”后,稍加整饰就变成秦国自己的国家量器,这说明文化上的“拿来主义”已渗透到秦的官方文化中,所以秦兵马俑、铜车马都是跨地域的总汇型文化;复次,秦兵马俑是“事死如事生”丧葬理念的彻底实践,这种理念强调一如对待生者的态度去对待死者,所以在具体形象的塑造上,不但如真人、真马一般大小,而且所有细节绝对一丝不苟,逼真如生,这又贯彻着秦文化朴实无华、严肃认真的一贯传统。

秦文化是一种高度集中的中心文化,从行事风格上说是说一不二、雷厉风行而且务求彻底,从规模上说,具有能最大限度调动举国之力的特点,因此可以完成极大规模的文化项目,都江堰、郑国渠如此,万里长城如此,直道、驰道如此,兵马俑也如此,而在当时的其他文化中,这些都是难以做到的。有这样的文化做支撑,中华第一帝国就在秦人的手中诞生,历史在秦王朝掀开了新的一页。

随着统一大潮的加速来临,秦文化在显示优点的同时也暴露出明显的缺点:过分强调力量,咄咄逼人,但又缺乏柔性、韧性,显得脆而不坚,不可一世的秦始皇在“沙丘政变”中神秘死亡,就反映出这种崇尚力量甚至暴力文化的致命缺陷;过分强调斗争,没有和谐的一面,社会处在高度的对立和紧张状态。秦王朝短短15年就夭亡,与其文化中缺乏和谐因素有很大关系;秦文化显得过于功利,缺乏理想因素和浪漫因素,缺乏想象力,这就很难产生持久的精神鼓动作用。秦代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民谣在流传,可见楚在人们心中的精神形象犹存,最后起而亡秦的果然是楚人为首。

二 楚文化

楚文化是一种地域文化，是一种曾经无限辉煌的文化。楚文化是雄奇洋丽的，是宏富多彩的。它的流布范围，最大时遍及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到达江浙、巴蜀和山东半岛，也就是当时的大半个中国。

楚人有着先进的生产技术，曾修建了能灌田万顷的芍陂和大量水利设施；楚国的工商业非常发达，国都郢都就是当时南方最大的商业中心；范蠡是楚人，后弃官经商致富，号“陶朱公”，被民间当成“财神”。楚地科学技术的进步，极大地推动了楚文化的发展。在金属冶铸方面，无论是冶炼设备还是冶炼技术，都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青铜器冶铸不仅采用了中原的分铸、焊合等法，而且创造了中原所没有的失蜡法或漏铅法；早在春秋晚期，楚国就有块炼铁和白口生铁，块炼铁已提高到块炼渗碳钢，简单的白口生铁块进步为形体复杂的铸铁器，并且有了铸铁柔化术；战国时代的天文学家甘公和石申创立了二十八宿体系，并著有《甘石星经》，在中国天文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中国考古史上最早的两张木床、第一双筷子、第一批完整的衣衾都出自楚墓，楚人的丝织业与刺绣工艺都巧夺天工，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丝织品，几乎囊括了先秦时期全部丝织品种。

春秋战国时期，楚文化异军突起。楚、晋两霸相争，实质上是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之间的碰撞和交融。楚国开疆拓土，所倚仗的不止是武力优势，而且还有着文化优势。楚文化的扩散，大致与版图的扩大同步。当时的淮夷文化，尤其是吴越文化，都被纳入楚文化的范畴。越王勾践的剑、吴王夫差的矛流落到楚国并在楚地出土，这本身就是楚文化胜利的象征。

楚国的学术成就，在当时的中国居领先地位。道家与儒家同时兴起，前者代表南方文化，后者代表北方文化。道家的奠基者是楚国的老子，主要著作为《道德经》，或称《老子》。楚文化的又一位领军人物庄周，追求个性彻底解放，其代表作《逍遥游》充满了对自由的向往，上天入地、纵横翻飞，至今读来令人神往。

惟楚有才。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以楚人最多。道家的老子、庄子、鹖冠子，名家的公孙龙子，兵家的孙子，法家的尸子，农家许行，纵横家的鬼谷子都是楚人；其他如墨家学派的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以及儒家学派的大师荀卿，也都长期居住在楚国，既受到楚文化的影响，也影响着楚文化。

楚国文学在战国时期达到先秦文学的顶峰，尤其是极富浪漫色彩的创作风格，对后世的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屈原的诗歌和庄周的散文。屈原身上集中了楚人与长江流域人们爱美、审美，奋力探讨自然界与人世间的优良品质，以他为代表的楚文学开创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先河，他为中国文学贡献了不朽的《离骚》；宋玉从骚体变化出赋体，《高唐》、《神女》二赋，是赋体文学的千古绝唱；李斯的《谏逐客书》，议论雄放而辞采华美，是战国晚期最出色的议论散文，他也是楚国人。

楚文化中的艺术文化更富于想象而多变化。楚歌与楚舞为其代表。湖北随州擂鼓墩1号墓出土的一套编钟多达64件，体量宏大，气势壮观，是世界上最早具有12个半音阶关系的定调乐器，其发现轰动世界，并成为楚文化中标志性的著名文物。钟子期、俞伯牙也是楚

人，他们的“高山流水”和知音之情，感动着每一个中国人。

楚国的美术作品琳琅满目，长沙楚墓出土的《人物龙凤帛画》、《人物御龙帛画》，是迄今为止保存完整的先秦绘画，都被视为国宝，也是当今所谓“国画”的先驱。湖北江陵出土的战国中期楚漆画——《聘礼行迎图》，是年代最早、保存最完好的先秦绘画珍品。

吴王夫差为了北上伐齐，开凿了一条沟通长江与淮河的邗沟，再由淮河北溯泗、颍等水而直抵中原，这就是后世大运河的最初雏形；吴越国的冶金术令举世皆惊：出土于湖北江陵的越王句践剑是“复合剑”的典范，“复合剑”即剑脊和剑刃铜锡配比不同，剑身经过硫化处理，两面均有菱形暗色花纹，科技含量极高，堪称当时的天下第一剑；吴越国的造船技术先进，已能造相当规模的战船，为赢得水上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凡此种种，真是说不尽、道不完的楚文化。但是，楚文化也有其短板、软肋。楚文化中的政治文化，显得迂腐而过时，它看重巫鬼及蛊惑之术，表现得浪漫多于现实，感性重于理性，屈原在楚国的遭遇就是因为这些原因。楚文化的传人项羽，勇冠三军、自诩“力拔山兮气盖世”，但在关键时刻却优柔寡断，被人讥为“妇人之仁”，最后因为“无面目以见江东父老”自刎乌江。这悲剧英雄的末路，正是由楚文化中包含的悲剧元素所催生。

三 汉文化

汉文化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文化之一，是构成中华文明链条最基本的环节之一，它也被视为中国文化的代名词。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一个巨大文化圈，被称为汉文化圈；中国的主体语言叫作汉语，文字叫作汉字，是联合国五大工作语言之一，在世界上是使用人数最多的；中国的主体民族是汉族，同时也是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单一民族；汉语中把强壮有力、有责任感、勇敢无畏的男人称为“好汉”、“汉子”，反之，对卖国求荣者则鄙称为“汉奸”；今天，汉文化这一概念得到世界的公认，外国凡研究中国的一切学问都被称为“汉学”，而研究者就是“汉学家”。汉文化是全世界唯一从未中断的古老文化，它一直延续了数千年，保持了无以伦比的延续性和传承性。今天，我们不能以大篇幅去一一描述汉文化的千姿百媚、雄风壮举，我们只能最简单地给汉文化的来龙去脉做一粗线条的勾画。

当刘邦莫都关中、建立起西汉王朝时，他面临的是艰难的文化选择：谋士陆贾对刘邦说了一番“您可以在马上得天下，却不可在马上治天下”的道理，刘邦被深深打动了。他明白现在需要一种强有力的文化作为治国的根本，但他需要的文化究竟是哪一种？刘邦是楚人，他自然熟悉并喜欢楚文化。刘邦当皇帝后，讨厌儒家的长服而喜爱楚式的短衣，一举一动都想模仿华丽的楚风，然而他很快就尝到了楚文化的另一种滋味：那些与刘邦一同打天下的文臣武将，带着楚文化浓厚的散漫习气，在商议国政的朝堂上大呼小叫甚至打架斗殴，对刘邦也只是以“刘老三”视之，根本没有把刘邦的天子身份放在眼里。此刻，一位曾做过秦朝博士的叔孙通自告奋勇，他参照秦朝的礼仪制定朝仪，并且率朝臣们反复演练。终于，在庆祝长乐宫落成的典礼上，忽然发现眼前一亮：朝臣们穿着等级森严的朝服，按部就班地整齐排列，怀着恐惧与谨慎的态度演礼如仪，口中三呼“万岁”，“自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肃静”，场面肃穆庄严，那种只有秦始皇时才有的朝廷威仪又出现在朝堂上。刘邦这时太得意了，情不自禁地说“我到今天才知道皇帝之贵也”！这是君主专权制的胜利，也是发生于

关中本土的周秦文化的胜利。至此，刘邦意识到，最适合于他的政治文化，并不是浪漫华丽的楚文化，而是那朴实无华、刚毅坚忍、注重实际且强调力量的周秦文化。就这样，西汉王朝在建国之初，基本的政治军事制度都直接取自灭亡了的秦王朝，所以史书上要称之为“汉承秦制”。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反思，秦始皇所建立的大一统的、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政治制度，这是汉王朝不能回避和轻易改弦易辙的，所以“汉承秦制”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是向先进文化靠拢或者是先进文化的胜利，不以个人对文化的喜好而转移的。

然而，在汉代的思想文化与艺术文化方面，在社会风尚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习俗中，却有着楚文化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刘邦来到关中，他的父亲刘太公根本无法适应深宫大院的豪华生活。他闹着要回家乡沛县的丰邑，同熟悉的乡亲饮酒聊天、斗鸡赌狗，继续在熟悉的楚文化环境中生活。刘邦被逼无奈，只好下令将故乡丰邑所有的居民连鸡犬都搬到长安附近，每家的房子都按照原样重盖，一切都同原来的丰邑一般无二，这个新的邑镇就取名新丰，其名称至今犹存，刘太公就在新丰度过了自己的晚年。刘太公的不适应，就是他所熟悉的楚文化在起作用。这样，西汉时期一方面是政治文化领域的“汉承秦制”，另一方面是日常生活领域的“楚风涟涟”，两种差异很大的文化在这时很自然地协调在一起了。很多论者强调汉文化中的楚文化比重，甚至认为汉文化就是楚文化，这一看法不能说全无道理，但并不全面和准确，应当区分来看待。

在汉代的艺术文化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楚文化的深刻影响。我们先谈著名的茂陵石刻。茂陵霍去病墓前陈放着十多件大型石刻，这是中国古代第一批大型石刻作品。正因为是第一批，没有成例可以遵守，所以匠师们也就不受固定创作模式的拘束，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各显身手。而这，就正好为想象力极其丰富的楚地匠师提供了用武之地。匠师们眼到心到，心到手到，大刀阔斧、因势借形，在原石自然形状的基础上开始雕琢。其手法朴拙而多样，或圆雕，或浮雕，或线刻；“马踏匈奴”是在高度象征性的命意中充满了纪念色彩，是一曲英雄主义的光辉颂歌；而大写意的“怪兽扑羊”、“人熊搏斗”，那些叫不上名字的怪兽，也都在极度的浪漫、夸张和怪异中凸显出狞厉而不恐怖的雄强之势，并且给人以无限的联想空间。匠师们继承了楚文化热爱自然、善于表现自然物的优良传统，将动物、神怪们都看作是同为天地生灵的自然朋友，所以对它们都做了人格化的处理。所有的作品都洋溢着浓郁的人情味，也都散发出强有力的生命运动气息。在这里，楚文化的浪漫、夸张和极富想像力的特长淋漓尽致地展示出来，从那“人熊搏斗”中我们分明读到了屈原《国殇》的奇诡意境，而正在扑羊的怪兽，其创意也许就来自《招隐士》中的“虎豹斗兮熊罴咆，禽兽骇兮亡其曹”，这就是楚文化之美。比之高度写实的秦始皇兵马俑，茂陵石刻是写实同写意并重的，艺术语汇是丰富多彩的，它完成了外来的楚文化与本土的周秦文化的衔接与融合。鲁迅先生说“唯汉唐文化深沉雄大”，也是以茂陵石刻为典型证据的。

西汉女俑，是汉代俑作中的佼佼者。她们身段十分柔美而面容姣好秀丽，不论站姿或坐姿，都蕴含着一种温柔、内向、含蓄的美。在造型手法上，汉代女俑一方面强调了纤纤细腰、强调了肢体的苗条、轻柔，这是汉代最崇尚的审美观，即所谓的“以瘦为美”；但另一方面，又将女俑的裙服很夸张地摊开，划出两道优美的双曲线，并使裙裾形成一个大的基座。这就弥补了造型上单纯讲“瘦”带来的过于纤弱、单薄的缺陷，给了人一种坚实、稳定的感觉，而且成为一种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人体造型。同虎虎生威的秦兵马俑相比，汉代女